

拉达克与清廷情报文书的传译过程

孔令伟

【摘要】 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间,清廷曾通过西藏地方政府与拉达克进行情报交流。来自拉达克的情报,首先以藏文书信的形式寄往西藏地方,经由以康济鼐与颇罗鼐等人为代表的西藏地方官员翻译为蒙古文,再由清廷驻藏官员译为满文并以奏折的形式寄往北京。通过重点考察藏、蒙古、满文相关历史档案,文章指出,拉达克与清廷间多语种情报文书的传递与翻译过程,深刻体现出清代中国作为多元一体国家的发展与性质。

【关键词】 拉达克;清朝;康济鼐;颇罗鼐;多语种文书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9)03-0114-11

一、前言

拉达克地区位处喜马拉雅山脉西缘以及喀喇昆仑(Karakoram)山脉南麓,东邻阿克塞钦(Aksai Chin),北毗巴尔蒂斯坦(Baltistan),西通查谟克什米尔(Jammu-Kashmir),就地理位置而言为南亚与中亚之间重要的交通渠道。7世纪以降,由于吐蕃对西域的经略,拉达克北部的喀喇昆仑山口和苏盖提(Suget)山口成为西藏高原通往塔里木盆地乃至葱岭以西地区的重要交通路线之一。^①由于地缘与文化关系的接近,西藏与拉达克在历史时期持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动与交往。^②

17世纪后期,由于准噶尔的兴起在中亚地区所造成复杂的地缘政治变化,清朝随之积极地展开相关情报侦探工作。至18世纪20年代,随着清军“驱准保藏”的军事行动,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得到巩固。与此同时,清廷更得以通过以西藏地方政府进一步与位处喜马拉雅地区西缘的拉达克王国进行联系,并开始通过拉达克王室搜集准噶尔相关情报,藉此进一步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情报网络。关于清廷通过拉达克搜集准噶尔情报一事,由于当时事属机密,现存拉达克与西藏方面之藏文传世文献着墨不多。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Luciano Petech)较早通过《清实录》等汉文官书梳理拉达克与清廷

^① 王小甫:《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A],收入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85页。

^② Luciano Petech, *The kingdom of Ladakh: c. 950—1842 A. D.*,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

之间的情报传递^①,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近年来随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系统性的整理与开放,尤其是《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②与《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③等相关档案的出版工作,研究者方得以进一步探索拉达克与清廷之间具体的往来关系,认识到18世纪来自拉达克的情报文书曾对清朝的边疆政策乃至地理认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清代中国认识当时印度、伊朗、中亚乃至俄罗斯提供了即时的动态信息。^④

整体来说,先行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利用满汉文档案补充过去清史研究中关于清廷与拉达克关系的研究空白,然而在相关藏文乃至蒙古文历史档案的解读与分析方面,则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实际上,拉达克经由西藏地方递往清廷中央的情报文书,最初是由拉达克方面以藏文书写随后经由阿里地区寄往拉萨,并由康济鼐、颇罗鼐等通晓蒙古文的西藏地方官员将拉达克寄来的藏文书信,笔译或口译为蒙古文,再由清廷驻藏官员译为满文,最终以奏折的形式上呈清廷。至于清廷发往拉达克的信息则同样通过西藏地方的联络管道进行传递,至于文书的传播次序则相反为满文—蒙古文—藏文。^⑤由此可见,就拉达克与清廷间情报文书的传递而言,相关满文档案的形成,准确地来说是在驻藏官员与清廷之间的联系环节中产生的,至于驻藏官员与西藏地方官员则主要使用蒙古语文交流,而西藏地方与拉达克的文书往来则通行藏文。

根据以上的梳理,可知现存满文档案中关于拉达克情报信息的记载,实际上转译自蒙古文,而蒙古文最初又译自藏文。因此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而言,满文档案中关于拉达克情报的记载自然十分重要,但也仅是拉达克情报信息传递的环节之一;与此同时,藏文与蒙古文书也在清朝欧亚情报网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换句话说,研究拉达克与清廷之间的情报传递,除了满文档案外,同样应该关注相关藏文、蒙古文历史档案,方能贴近历史时期拉达克与清廷文书交流之实况。

由是观之,拉达克、西藏地方与清中央三者之间情报文书的传递与翻译过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文重点解读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之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历史档案,以考察拉达克与清廷之间以藏、蒙古、满文所撰写的往返信件,重点分析该多语种文书传递与翻译过程,藉此梳理清朝欧亚情报网在喜马拉雅地区西部一线的发展、运作与延伸,以期对拉达克与清廷间情报文书的传译过程进行更为全面的历史学分析。

二、康济鼐与拉达克情报网的建立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间,蒙古文在西藏政治圈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具体反映在当时不少西藏地方官员通晓蒙古文的历史事实上。究其原因,这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与1642—1717年间和硕特汗廷在西藏与青海地区所形成的蒙藏联合政权有关。^⑥即便在1655年固始汗逝后,和硕特人在卫藏地区实际的政治影响相对有所收缩,然而出于实际的政教目的,此后卫藏精英仍不乏学习蒙古文字者。如1687年第悉·桑杰嘉措(ཤེ་སྤེན་ཀའང་ལ་བླ་མ་བླ་མ་ཤེ་ 1653—1705)编撰之《度量法式·育明辨心》(ཆ་ཚད་ཀྱི་དཔེ་ཅིན་དཔྱད་པ་ལྟོས་ལྟོས་ལྟོས་)中,便提供了蒙古文阿礼嘎礼字(ཨ་ལི་ག་ལི)的标准写法,并在左侧用墨笔标注“蒙古文字”(མོང་ག་ལི་)

① Luciano Petech, *The kingdom of Ladakh: c. 950—1842 A. D.*, pp. 71—85.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④ 齐光:《清朝的准噶尔情报收取与西藏王公颇罗鼐家族》[J],《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6年第10辑。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J],《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陈柱:《“驱准保藏”与清朝和拉达克的最初关系》[J],《中国藏学》2019年第1期。

⑤ 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36—37页。

⑥ 关于和硕特汗廷在西藏与青海的统治,可参乌云毕力格:《略论和硕特汗廷对西藏的统治》[J],《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乌云毕力格:《论和硕特汗廷在青海的统治体制》[J],《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否加封拉达克王一事。雍正三年十一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奏称：“今据游击王刚秉称康济鼐差人至今尚未到陕，但喇荡罕情愿请封与否之处，必问康济鼐，定知实情。今王刚随钦差进藏，臣欲作自己意见写书一封，付王刚带去，问取康济鼐回音……[朱批]汝此意见甚好，朕亦面谕王刚矣。”^①在这封奏折中，岳钟琪再次提及拉达克王是否愿意向清廷请封一事，并且强调决议此事“必问康济鼐”。为此岳钟琪派遣了一位名为王刚的关键人物，随同雍正帝派遣的钦差鄂齐一同进藏。为了向康济鼐打听拉达克王的请封意愿，这位王刚不仅曾将岳钟琪的密信带往西藏转给康济鼐，雍正帝甚至曾亲自面授机宜，可见对于清廷而言事关重大。那么这位曾在岳钟琪手下担任游击的王刚，究竟何许人也？

实际上，此人即曾任陕西固原提督的樊廷（？—1738）。根据清史馆传稿《樊廷列传》称：“樊廷，武威人，康熙中随父智亮流寓四川，入永宁协行伍，军名王刚。随征乌蒙及青海、西藏，积功补千总。雍正初，迭迁漳腊守备、陕西兴汉游击、庄浪参将、洮岷州副将。六年肃州总兵，七年奏复姓名。”^②又据《内阁大库档》乾隆三年（1738）樊廷病逝后鄂尔泰题请追赠本，樊廷曾于雍正三年至四年间担任陕西兴汉镇标游击，并于雍正四年至五年间任庄浪营参将。^③由此可见，这位雍正三年年末被雍正帝与岳钟琪秘密派往西藏联系康济鼐的王刚，也正是后来成为清朝一方封疆大吏的樊廷。

樊廷在随同钦差鄂齐入藏的过程中，曾经进行过详细的日程记录以及情报调查工作。樊廷于雍正四年（1726）四月初三由打箭炉出发，经理塘、巴塘一路入藏，五月初四抵达乍丫（察雅）、义木多（昌都），六月二十二日抵达拉萨，最终在七月初七抵达后藏。樊廷在前后藏调查西藏政局情况与人心向背，于八月初三自前藏返回内地，途经成都最终在同年十一月初六抵达西安，向岳钟琪报告在藏所获情报。^④樊廷此次入藏的主要任务，便是代岳钟琪向康济鼐打听拉达克王是否愿意向清廷请封一事。岳钟琪也随即在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将樊廷所获情资上奏雍正帝：“窃臣前具奏拉荡罕封号一事，于参将王刚进藏时，臣密令与康济鼐闲话之际，作己意探问去后，今据王刚秉称住藏之日，与康济鼐闲坐叙话，因谈及拉荡罕从前效力并问其驻牧地方。”^⑤根据岳钟琪的指示，樊廷佯装私下与康济鼐闲聊，实际上是为了暗中打听拉达克对于请封一事的可能性。虽然清廷最终因为考量拉达克对莫卧儿帝国的顾忌而暂缓加封拉达克王一事^⑥，然而樊廷的入藏之行却也促成了清廷对拉达克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逐步确立了清廷通过以康济鼐为首的西藏地方官员收取拉达克情报的边疆策略。

除了通过派遣边将亲信入藏打探情报外，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清廷更多的是通过文书往返从康济鼐处获得拉达克相关情报。在樊廷抵达西安不久后，岳钟琪在雍正四年十二月间又收到了康济鼐寄来的蒙古文书信，并随即向雍正帝上奏：

窃臣十二月初五日，行至汉中府属地方，接康济鼐蒙古字来文一角，随即译出，内称驻劄阿里克地方噶布锡鼐^⑦于今年七月内接臚档罕^⑧处信息，并土克城办事人马克拉木巴、盆楚克拉布坦所送书信，俱于今年八月内到藏……上闻所有康济鼐原文，诚恐番译舛错，理合一并恭呈睿览……[朱批]原文留中……^⑨

通过这份奏折，可以看到当时来自拉达克的情报文书，首先寄往邻近的阿里地区，并经康济鼐之兄阿里总管喀锡鼐（即引文中的噶布锡鼐）转发至拉萨，随后由康济鼐方面译为蒙古文寄给负责清朝西北

① 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Z]，故宫博物院，1978年，第5辑，第405页。

② 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档传稿传包，《臣工列传·樊廷列传》[Z]，文献编号：701005962—5。

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Z]，档案号：070312。

④ 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故宫博物院，第6辑，第854页。

⑤ 同上，第856页。

⑥ 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30—32页。

⑦ 即康济鼐之兄喀锡鼐·色布登喇什（དཀར་འཕྱིན་མཆོད་འཕྱིན་པཌ་ཤེས་），时任阿里总管。

⑧ 即拉达克汗之异写。

⑨ 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故宫博物院，第7辑，第134页。

如前所述,康济鼐对于蒙古文乃至文化的浸淫,与和硕特汗廷的遗产有关,而这也反映在其属民的蒙古成分上。和硕特汗廷灭亡后,拉藏汗在拉萨留下数百名来自青海的属民,这些人最终在清廷的同意下由康济鼐收编。雍正五年(1727)六月十八日康济鼐为阿尔布巴(ར་ཁུ་བུ་པ།—1728)等人所害后^①,清廷因现实的统治考量,决议将这些滞留卫藏的原拉藏汗属民送回青海^②,不过作为和硕特汗廷遗产的蒙古文却仍持续活跃于西藏的政治舞台上。

康济鼐被害后,拉达克与清廷之间情报文书的传译不仅没有彻底中断,反而随着在雍正六年(1728)下半年由颇罗鼐(པོ་ལ་རྒྱལ། 1689—1747)掌握西藏政务后,进一步得到巩固。雍正八年至九年(1730—1731)间,拉达克发生王位继承之争,拉达克王尼玛纳木扎尔的长子德中纳木扎尔依靠以颇罗鼐为首的阿里藏军势力逼退继母与异母弟,终得顺利继承王位。拉达克新王与颇罗鼐之间的友好关系,又进一步巩固了清廷与拉达克之间的情报联系。^③不仅如此,相较于康济鼐时期,颇罗鼐执政以后拉达克情报文书的传递渠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同于康济鼐通过年羹尧、岳钟琪等担任川陕总督的汉人将领向清廷传递拉达克情报,颇罗鼐则多半经由马喇、青保等驻藏大臣与清廷交流拉达克情报,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何以现存满文档案中拉达克情报相关记载集中出现在雍正九年以后。^④

[illegible]

罗鼐通晓蒙古语文,他与清廷之间的沟通同样也是经由蒙古语文。^①雍正五年(1727)康济鼐遇害后,阿尔布巴等卫藏势力与颇罗鼐所率领之阿里藏军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斗争。雍正六年(1728)五月,西藏三大寺僧人曾试图居中调停、弭平战祸,并为此事求见当时代表清廷驻藏的副都统马喇与内阁学士僧格,对此岳钟琪在雍正六年六月的奏折中写道:

六月二十八日,据驻防藏地参将颜清如乘称:“五月初八日,有西藏卜勒奔、塞喇、噶尔旦三大寺院^②喇嘛,赴二位大人上恳求伊等情愿赴后藏与颇罗鼐二家复行说和,停兵侯旨之语。二位大人即依允,所回随番译彝文一角附交喇嘛等,于十一日自藏持赴颇罗鼐处……^③

由此可见,在雍正六年平定阿尔布巴之乱前,清廷驻藏官员曾通过三大寺僧人转交一份用“彝文”翻译的书信给颇罗鼐,而此处所谓的“彝文”指的正是蒙古文。而自阿尔布巴之乱平定后,清廷任命颇罗鼐综理藏务,西藏地方局势逐步恢复稳定,而清廷与拉达克之间的情报线路又再次获得发展。如前所述,雍正八年至九年间,德中纳木扎尔通过以颇罗鼐为首的阿里藏军的威势,顺利逼退政敌继承拉达克王位,此后颇罗鼐与德中纳木扎尔遂得以比照康济鼐与尼玛纳木扎的前例,为清廷翻译、传递来自拉达克的情报文书。

这些来自拉达克的情报所涉及的地理范围甚广,主要由拉达克人获取自往来于中亚、叶尔羌与印度的穆斯林商团,内容以准噶尔的政治、军事、外交情况为核心,又牵涉当时中亚、印度、俄罗斯等地动态。这些来自拉达克的情报内容传达至清廷后,以满文奏折的形式被集中发往军机处,从而今日得以被相对集中地保存在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不啻为考察18世纪欧亚大陆史的重要史料。关于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所保存之18世纪拉达克情报文书的具体内容与历史意义,笔者业有专论;^④然而就探讨拉达克与清廷间的情报传译而言,尤其是藏文、蒙古文与满文等多语种文书间的传译过程,仍有进一步的推进空间。

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说,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数量相对丰富,主要反映出驻藏大臣与清廷之间的联系过程,然而这仅是清朝拉达克情报网的环节之一。至于要具体分析拉达克、颇罗鼐与驻藏大臣之间的信息往来,则不能不关注对应的藏文以及蒙古文历史档案原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清代奏折制度的运作模式,官员在上奏翻译文件时,时常附上原文文书作为奏折附件,如前述雍正四年十二月间岳钟琪上奏康济鼐寄来蒙古文书信之汉译内容的同时,亦称“上闻所有康济鼐原文,诚恐番译舛错,理合一并恭呈睿览”;雍正帝则在此句旁书朱批“原文留中”。除了康济鼐等人根据拉达克藏文书信所翻译的蒙古文书外,拉达克王寄给颇罗鼐等人的藏文书信原件,也曾辗转经由驻藏大臣作为满文奏折的附件发往清廷。这些作为满文奏折附件的藏文与蒙古文文书的原件,在满文奏折的抄录誊写过程中与录副奏折一并归档,从而被保存在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之中。

这些分别由拉达克统治者书写的藏文信件以及由颇罗鼐等西藏地方官员所翻译的蒙古文书,对于研究拉达克与清廷情报文书传译过程来说,无疑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由此可见,对清代档案中所保存的拉达克藏文书信原件以及相关之蒙古文翻译文书进行史源发掘与直接研究,对于推进清史、蒙藏学乃至拉达克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然而困难的是,这些原本作为奏折附件与满文录副一并归档的拉达克藏文文书原件,由于某些历史原因被拆散打乱。如何在数以万计的档案中找到原本对应的拉达克藏文书信、蒙古文翻译以及满文奏折,成为今天深入研究清廷与拉达克关系的重大难点。

幸运的是,笔者2015年8月间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一份以藏文草书书写的藏文书信。这份藏文文书原文本身无署作者、收信人以及年月,然而收藏文书的信封上以满文标注《拉达克德中纳木扎尔给贝勒颇罗鼐的行文》(ladak i dejung namjal. beile polonai de unggihe tanggūt

① 齐光:《清朝的准噶尔情报收取与西藏王公颇罗鼐家族》,《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10辑,第95页。

② 即哲蚌(འབམ་ཐུང་པོ་)、色拉(ཤི་ལ་)与甘丹(དགའ་ལྷན་གྱི་ཆོས་ལུང་)寺。

③ 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故宫博物院,第10辑,第717页。

④ 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

bithe:)①,据笔者考证,正与军机处满文录副档中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五《驻藏大臣青保奏闻颇罗鼐所得准噶尔信息折》②具有对应关系,并首先利用这组藏文、满文档案的部分内容进行相关研究。③这组拉达克藏文书信以及满文奏折,是国际学术界最早发现也是目前唯一一组公布的清代拉达克藏文文书及其对应的满文奏折,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是体现清代内地、卫藏、阿里与拉达克之间友好交流与信息沟通的关键证据,对于研究清代多元一体国家格局下的边疆政策具有突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在此首先对这组拉达克情报文书的藏、满文全文进行汉译,并介绍其相关历史背景;进而在比较拉达克藏文情报文书原件与满文奏折译本的基础上,对拉达克与清廷情报文书的传译过程进行系统梳理。

如前所述,随着1730年代初颇罗鼐综理西藏事务及其与德中纳木扎尔友好关系的建立,雍正九年(1731)前后清廷又得以继续通过拉达克对准噶尔进行情报搜集。雍正十年(1732),喀尔喀多罗郡王策凌(ering,?—1750)于额尔德尼召击败准噶尔部队,噶尔丹策凌率残部逃回准噶尔本部。在噶尔丹策凌撤回准噶尔后,清廷于雍正十一年(1733)初曾通过驻藏大臣青保指示颇罗鼐,佯装已意将清军于额尔德尼召击败噶尔丹策凌的消息透露给拉达克王德中纳木扎尔,目的在于通过拉达克人向来自叶尔羌与喀什噶尔等地的穆斯林商团宣传准噶尔人败逃的消息,用以打击其威信。④为此青保除了将雍正帝的上谕译为蒙古文交予颇罗鼐外,并且曾与其就此事当面进行商量。颇罗鼐对此回禀称:“将大皇帝赐教之谕旨充作鄙意,写为藏文,派遣鄙人信赖之达尔罕宰桑以及驻阿里统兵之长官额尔克朝克图连同礼品一并赍往德中纳木扎尔后,将德中纳木扎尔属下行商之好回子遣至叶尔羌、喀什噶尔,复从该处将此消息送到阿克苏、库车、布哈拉、撒马尔罕、辟展、哈萨克、布鲁特等地回子直至准噶尔边界处所有之回子。亦将此消息传至巴扎汗处。”⑤由颇罗鼐的回禀可见,为了在中亚各地乃至印度莫卧儿帝国处散播清军击败准噶尔的情报,雍正十一年上半年颇罗鼐曾将雍正帝的上谕改写为藏文书信,并随即派遣两位名为达尔罕宰桑与额尔克朝克图的亲信将该信送往拉达克王德中纳木扎尔处,而德中纳木扎尔也随后在同年十一月前后向颇罗鼐回复一封藏文信件,这份藏文文书的原件便是前述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拉达克德中纳木扎尔给贝勒颇罗鼐的行文》⑥。颇罗鼐在接到德中纳木扎尔的藏文信后,又译为蒙古文转交予驻藏大臣青保,最终又译为满文并以满文奏折的形式上呈清廷。⑦以下根据对应之藏、满文版本,将《拉达克德中纳木扎尔给贝勒颇罗鼐的行文》全文翻译如下,并将藏、满文原文转写附录文末:

【朱批】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日所奏中,称谨依旨而行,将此移交予蒙古衙门,咨交丕雅图与常宜,又应准之处,将应行料理者具即办理。

【奏折】奏。奴才青保等谨奏。为密奏闻事。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一,贝勒颇罗鼐将寄来拉达克之德中纳木扎尔所得消息之书信,呈交给奴才。将其大略译看后,贝勒呈请明鉴。⑧

“贝勒先前遣来额克朝克图、达尔罕宰桑二人,小人即派人前往叶尔羌。在喀尔喀之地大皇帝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Z],折件,无年月,档案号:03-0173-0945-001。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册,第362—364页。

③ 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39—42页。

④ 齐光:《清朝的准噶尔情报收取与西藏王公颇罗鼐家族》,第99—102页。

⑤ 满文原文:amba ejen i tacibume unggihe hesei bithe be. meni gūnin obume. tanggūt i bithe arafi. meni akdara darhan jaisang. jai ari de cooha be kadalamete tehe daruga erke coku sebe tucibufi belek suwaliyame. dejung namjal de takūrame unggifi. dejung namjal i fejergi hūdšaame yabure sain hoidz sebe tucibufi. yarkim. hasihar de isibume takūrafi. tederi ci geli aksu. kūce. buhar. samarhan. pijan. hasak. burut i jergi baci hoidz. jun gar i ujan de bisire hoidz sede isitala. ere mejige be isibukini. baja han de inu ulame ere mejige be isibukini.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册,第18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折件,无年月,档案号:03-0173-0945-001。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册,第362—364页。

⑧ 以下内容为藏文信件内容,此前内容为满文奏折描述事由所加。

军队征讨准噶尔之兵,准噶尔部队败北后,遁投游牧地,随其势力衰微,如今叶尔羌、哈萨克、和硕特、土尔扈特人等乘此机缘,理当报复,日后对两造足有大益。叶尔羌之诺颜喀本宰桑闻此密告,捕获内地探子,解送至准噶尔。噶尔丹策零道:‘汝拉达克之人携来货物,前来打探叶尔羌之消息,将实情招告,若不告来,处死。’告曰:‘我二人为协噶^①人,随回子一同前来叶尔羌等地做买卖被俘,被送往此地,绝非为打探消息而来之人。又卫、藏、阿里等地皆弘扬黄教,众生安乐。图白忒之骑兵,较从前更勤于操练,哨卡、后卫现已巩固,除此之外,我等再无可禀告之语。望您知悉。’噶尔丹策零将我等二人交付予一宰桑后,令其看守。两月过去,毋让见人,此后反倒给予盘缠遣回。我等二人在时,据闻对俄罗斯方面增添哨卡,又遣去使者甚多。我等二人获告去年准噶尔之部队在喀尔喀地方败溃,有人如此说道;又有人云,自从策旺阿喇布坦亡殁,诸边人等皆随之起兵,如何处之,未可断定,忧惧非常。又一日见到苏尔杂^②告曰:内地军队业已进逼,此后又复逼近,准噶尔无法固定游牧地。据说今年八月分兵两路。又据一为准噶尔还俗喇嘛之人所告,此次行军二路之兵,若可则与内地军队交战,不可则遣去盗窃牲口。又进兵哈萨克,不知胜负。叶尔羌等诸人,与准噶尔不睦,皆称日后大皇帝之军队必定击败准噶尔。此二人与叶尔羌行商之哈瓦伊伯克一同于九月终前来,即刻将此消息书写后呈报。”^③为此,将拉达克之德中纳木扎尔寄与颇罗鼐之藏文书信翻译,谨为密奏。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五,都统青保、副都统马喇、卿苗寿^④、总兵官臣周起凤。

根据这份藏文《拉达克德中纳木扎尔给贝勒颇罗鼐的行文》及其对应满文奏折,可以将18世纪30年代以后,拉达克与清廷之间的情报传译过程主要划分为三个环节:一、拉达克王与颇罗鼐等西藏地方官员间的藏文书信往返;二、颇罗鼐等西藏地方官员与清廷驻藏大臣之间的蒙古语文沟通;三、驻藏大臣与清廷之间的满文公文往返。而这三个分别以藏、蒙古、满文为媒介所共同构筑而成的拉达克与清廷情报文书传递网络,正反映出清朝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国家格局。

拉达克情报网与清朝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国家格局,有着紧密关联,这点具体体现在满、蒙古、藏文多语种情报文书的信息交流以及边疆安全的巩固上。除了清中央政府的军机处档案外,近来出版之《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⑤所收录的历史档案亦可验证此关键进程。乾隆十一年(1746)驻藏大臣衙门为赏赐拉达克王事以蒙古文行咨郡王颇罗鼐,根据咨文的内容,可知清廷对拉达克的赏赐文书,系由理藩院拟定满文,并经由乾隆帝御览修改,复由内阁蒙古堂译为蒙古文与藏文,最终经由颇罗鼐转交拉达克王。^⑥由此足见,清廷在与拉达克进行联系时,其文书曾先后经过理藩院、皇帝本人与内阁三方进行修订与翻译,从而形成满、蒙古、藏文三种语文的版本,这也显示出清廷在处理与拉达克关系时曾十分重视满、蒙古、藏文多语种文书并具有一套系统性的文书对应处理机制。

四、结语

清廷与拉达克的双向联系中,作为西藏地方官员与清廷驻藏官员共同语言的蒙古文,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通过蒙古文文书从拉达克所传递而来的情报信息,也深刻地影响了清朝的边疆决

① 协噶(藏文 རྒྱལ་མཁའ་ 满文 sihar),拉达克境内城市,在今日印度列城南15公里。

② 苏尔杂,拉藏汗之子,为准噶尔掳作人质,清廷曾顾虑噶尔丹策凌利用其作为干预藏事的借口,相关考证参见乌兰巴根:《准清争夺西藏的余韵:召地立汗问题》[J],《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18年第9辑。

③ 藏文信件内容到此为止。

④ 时任大理寺卿。

⑤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Z],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

⑥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第4册,第295—296页。

策。乾隆二十年(1755)阿睦尔萨纳背叛清朝后,^①清廷也曾通过阿里藏军向拉达克收取阿睦尔萨纳的相关情报。1756年四月底,阿里地方两位第巴曾派遣亲信探听阿睦尔萨纳信息,这份藏文报告被摘译为蒙古文书送至驻藏大臣衙门,内称“拉达克人及喀齐商人言:在蒙古地方,因达瓦齐诺颜与阿穆尔撒纳二人不和、多行诡计,图什墨勒^②皆不从”。^③通过拉达克与中亚穆斯林商人,阿里第巴曾获取准噶尔内部矛盾的情况,并以蒙古文文书的形式传递给拉萨的驻藏大臣。可以合理推测的是,这些类似的边疆情报很可能也曾被驻藏大臣译为满文并以奏折的形式上呈清廷。

随着18世纪50年代末准噶尔的覆灭以及大小和卓的平定,清廷对于拉达克情报的需求有所转变。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上谕:“今将军等奏报,霍集占等逃入巴达克山,被伊部落人等擒获,俟其献出时,再行降旨。嗣后拉达克汗处,不必遣人探信,着官保等传谕知之,仍赐拉达克汗缎二端。”^④乾隆帝的这份上谕也被翻译成蒙古文,由驻藏大臣官保以及西藏摄政第六世第穆呼图克图(དེ་མཆོད་ཐོག་ལྷ་སྐུ་འཕགས་པ་…… 1722—1777)共同遣使通告拉达克王明确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已全部纳入清朝版图,将来不必再派人打探消息。^⑤此后拉达克与清廷间虽仍有文书往来直至18世纪60年代,然而拉达克方面来文却逐步改用波斯文取代藏文,而清廷与拉达克情报文书的传递规模也发生了本质上的收缩。^⑥

综上所述,拉达克与清廷情报文书的传译,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驱准保藏”以降,并在康济鼐综理藏务时期逐步形成以下的传递路线:拉达克(尼玛纳木扎尔)—阿里(喀锡鼐)—拉萨(康济鼐)—川陕(年羹尧、岳钟琪)—北京(雍正帝)。而这个情报网络的基础在于藏、蒙古、满文等多语种文书之间的传递与翻译。从拉达克到拉萨一路,以藏文书信为主;从拉萨到川陕一路,以蒙古文翻译文书为主;至于川陕与北京之间,则以满汉文奏折为主。

雍正五年(1727)康济鼐遇害后,拉达克与清廷之间的情报交流并没有完全停止。雍正六年(1728)以后颇罗鼐接替康济鼐,成为清廷与拉达克二者重要的中间人。与康济鼐相同,颇罗鼐继承了18世纪藏地贵族使用蒙古语文的传统,进而得以与代表清廷的驻藏官员相对顺畅地进行交流,而驻藏大臣的职能也因此得以提升,从而使得拉达克情报文书的传译过程转变如下:拉达克(德中纳木扎尔)—阿里(珠尔墨特策卜登)—拉萨(颇罗鼐)—驻藏大臣(马喇、青保等人)—北京(雍正帝)。换句话说,就拉达克情报的传译过程而言,拉萨的驻藏大臣逐步取代了川陕总督,这一方面体现了清朝在西藏的统治获得巩固;另一方面拉萨取代川陕成为清朝直接处理拉达克情报的信息节点,也体现出清朝拉达克情报网在行政效能与地理距离上的推进。而清代国家对拉达克情报网的积极支持,也随着对准噶尔的战略以及对西域的经营,得以一直持续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小和卓之乱平定前夕。

附录:雍正十一年(1733)《拉达克德中纳木扎尔给贝勒颇罗鼐的行文》

(满文信封题名ladak i dejung namjal. beile polonai de unggihe tanggūt bithe:)

一、藏文原件转录^⑦

① 相关研究参见承志:《阿睦尔萨纳“叛乱”始末考(上)》,《追手门学院大学国际教养学部纪要》2015年第8期。

② 准噶尔官职,蒙古文tüsimel意为“大臣、长官”。乾隆御制诗《蕃甲行》旁注“噶尔丹策凌于其诸宰桑中择四人为图什墨者,大臣之称也”。弘历:《御制诗文十全集·再定准噶尔》[Z],卷7,第3页,武英殿聚珍本。

③ 蒙古文原文:ladak-un ulus. k'aci-yin qudalduyčin-u kelekü üge. mongyol oron-a dawači noyan ba. amur šaanaya quyayulan ülü jokilduqu oblan olan kigsen tula. tüšaimel čöm es-e dayaqu.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第5册,第357页。

④ 《清高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597,第662页。

⑤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第4册,第29—30页。

⑥ 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45—47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折件,无年月,档案号:03-0173-0945-001。

2. རྒྱལ་རྒྱུ་མེར་ཁོ་ཚུ་དང་། དྲར་གྲན་ར་སང་གཉིས་ཡོངས་པའི་དོན་སྐོར་ཡར་གིན་རྒྱ་གར་དང་། ཁར་ཁར་
3. རྒྱལ་ས་སྤྱོད་མ་ཆེན་པོའི་དབྱེད་ཆེན་གི་རྒྱུ་འགར་འཕམས་ཤིང་། འཕྲོས་རང་ལྷུ་དུ་ཤོས་པས་གཤེད་མོ་མེད་པར་སོང་བ་
4. དཀྲོས་ཡར་གིན་ཁ་སག་ ཁོ་ཤོད། མོར་ཁོད་རིས་གཤེད་མོ་བརྟན་ནས་དོ་མོག་ བད་ཞིག་བྱས་ན་ལ་དགས་མི་དབང་
5. བཅས་ཀྱི་རིམ་བཞེན་གོང་མའི་སྐྱེན་རྒྱུལ་པའི་འདི་ལྷི་གཉིས་ཐད་རྒྱ་གར་པོ་དོར་ལོང་ཚུལ་གང་འདིའི་བཤད་
6. འདུག་པ། ཡར་གིན་གྱི་མཁར་དཔོན་ཁ་སྐྱེན་ར་སང་གི་ཐོས་ནས་དྲི་བ་དང་། རྒྱ་ནག་པའི་ས་ཁུལ་ཡིན་ཡོད་
7. འགྲོ་བས་སོག་ལུ་བཟུང་ནས་བཀལ་བཏང་། དགའ་ལྡན་ཆོ་རིངས་ནས་ཁྱོད་ལ་དགས་ནོར་སྒྲངས་ནས་ཡར་
8. གིན་རྒྱུལ་མ་ལ་ཡོངས་པ་ཡིན་སོགས་དྲི་བ་མང་བ་དང་། སྐད་ཆ་དྲང་པོར་བཤོད། མ་བཤད་ན་འབྲིད་རྒྱུ་མཁུ་བཏང་དེ་
9. ནས་ཀྱང་མ་བཤད་ན་གསད་རྒྱ་ཡིན་ཟེར་ལའ་འདུག་ དེ་ལན་དབྱུག་གཙང་མངའ་རིས་ནམས་སྤྱོད་མེར་གྱི་བཟུན་
10. པ་དར་ཤོ། མེར་རྒྱ་དམས་པ་དེ་ཞིང་སྤྱོད་པ། བོད་ཀྱི་དམག་མི་རྣམས་རྟ་དམག་སྤྱིགས་པའི་སྒར་དང་མི་འདྲ་
11. པའི་སོ་འོན་མེར་དམག་སོགས་ལྟ་འགྲིག་པ་འདུག་འཆོས། དེད་གཉིས་ཤེལ་ཁར། ཡར་གིན་སོགས་སྤྱོད་རྒྱུ་ཆོར་
12. པའི་ཁྲོ་པོར་ཡོངས་པ། སོག་ལུ་རྒྱ་བཀལ་བ་ལས་ས་ཁུལ་བ་མིན་གཞན་སྐད་ཆ་བཤད་རྒྱ་ནི་མེད་པས་
13. གསད་བཅད་ཅི་གནང་ཀྱང་ཁྱེད་སྤྱོད་བཅད་བཅད་ལུག་པ་དང་། དེ་ནས་ར་སང་གི་གཅིག་གི་རྒྱར་ཁྲོ་བ་གཉིས་མི་དང་
14. རྒྱག་མ་བཅུག་པའི་བཞག་ ལམ་ཆས་སྤྱད་ནས་ཕྱིར་སྤྱོད་ དེའི་རིང་ཨོ་རྒྱ་སྤྱོད་པས་ལ་སོ་པ་ཡང་གཏོང་། མོ་ཉ་
15. གདོས་ཆེ་བ་ཞིག་གཏང་སོང་ཟེར། དམངས་མ་རྣམས་ལ་ན་ནིང་ཁར་ཁའི་ལུང་པར་རྒྱུང་འགར་རྩས་འཕམས་འདུག་
16. མི་རེ་གཉིས་ལ་ལའ་པར། ལ་ལ་རྒྱས་འདྲ་མཉམ་བྱུང་ཚུལ། ལ་ལས་རྟོར་ཐའི་རི་གཤགས་སྤུས་མཐའ་ཐམས་ཅད་དག་
17. ཡིན་ད་གག་རྒྱག་འདུག་པས་ག་འདྲ་མཐོང་ཡོང་མི་བཤེས་འདུག་ཟེར་བཅམས་སྤྱོད་སྤྱང་བྱེད། ཉིན་གཅིག་སྤུས་
18. ལྷར་ས་ནས་རྒྱ་དམག་གི་སྤར་ལས་ཉེ་བར་བཅར་འདྲོད་པ་དང་། ད་ནས་ཀྱང་ཉེ་བར་བཅར་ནས་རྟོ་རྒྱས་སྤྱད་ན་སོག་ལུ་
19. རྒྱ་མི་རྒྱུགས་འདྲ་གསུང་དེས་ཡིན་འདུག་ དམག་ཆེད་ཁག་གཉིས་འདི་ཡོ་ཁྲོ་བ་བརྒྱད་པའི་ནང་རྒྱ་བ་ཐོན་སོང་ཟེར་བར་སྤྱོད་
20. འགར་བཙུན་མོག་ག་པ་གཅིག་ནས་རྒྱ་དམག་ཁག་གཉིས་ལ་ཐབས་རྩས་ན་དང་། དེ་མིན་རྟ་ཁལ་བརྒྱ་བར་བཏང་
21. སོང་ཞིང་། ཁ་སག་ལ་དམག་གཏང་བ་རྒྱལ་འཕམས་མ་ཐོས། ཡར་གིན་སོགས་མི་དམངས་སྤྱོད་འགར་པར་ཞེན་ཤོར་
22. ཞིང་། རྒྱགས་གོང་མའི་དམག་རྒྱལ་བར་ཐག་ཆོད་ལྟ་བུ་ཟེར་མཆོས་པས། འདི་ཁའི་མི་གཉིས་པོ་ཡར་གིན་གྱི་
23. ཆོང་པ་རྟ་མམ་སྤྱིག་ཟེར་བའི་ཆོང་པ་ཐོར་བྱ་དང་བཅས་ཁྲོ་པ་འཇུག་ལ་འཁྱོར་འཕྲལ་གནས་ཚུལ་རྒྱ་ལུ་ལགས།

(362 – a). hūwaliasun tob i juwan emuci aniya jorgon biyai juwan de wesimbuhede. hese ginggurehe songkoi obu sehe. erebe monggo jurgan de afabufi piyatu, cang i de bithe yabubu. jai yabubuci acara bade gemu yabubu ichihyaci acarangge be uthai ichihyakini. (362 – b) wesimburengge. aha cingboo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narhūšaame donjibume wesimbure jalin. hūwaliasun tob i juwan emuci aniya, omšaon biyai juwan emu de. beile pholonai. ladak i dejung namjal i baha mejige be jasiha bithe be, aha mende alibuha be murūšaame ubaliyambufi tuwaci. beile genggiyen de aliburengge. beile neneme erke cokto. darhan jaisang juwe niyalma be takūrafi isinjiha manggi. buya bi yerkim de niyalma takūrafi. kalkai bade amba ejen i cooha. jun gar i cooha be dailafi. jun gar i cooha gidabufi. nukte be (363 – a) baime burulaha. hūsun mohoho be dahame ne yerkim. hasak hūsot, torgūt i urse. ere nashūn be tuwame. kimun be gaici acambi. amaga inenggi juwe ergide ambula tusa ombi seme narhūsame alaha be yerkim i noyan k’abun jaisang donjifi. dorgi mejige gaire niyalma seme jafafi. jun gar de benebuhede. g’aldan cering. si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册，第362—364页。

ladak i hūdašara jaka be gajifi. yerkim i mejige gaime jihe niyalma. yargiyan babe ala. aika alarakū oci. wambi. serede. alarangge meni juwe nofi sihar. yerkim i jergi bade hoise i emgi sasa hūdašaame jihebe jafafi ubade benjihe. umai mejige gaime jihe niyalma waka jai wei. tsang. ari ba i gubci suwayan šajin be badarambume. geren ergengge jirgame bi. tubet i moringga cooha be urebume. neneheci fulu umesi (363 – b) kiceme karun fiyanji be akdulame bi. ereci tulgiyen. mende alara gisun akū. wajibe suwe sambu seme alahade. g'aldan cering. meni juwe niyalma be. emu jaisang de afabufi tuwakiyabume. juwe biya ofi niyalma de acabuhakū. amala elemangga kunusun bufi amasi unggihe. meni juwe niyalma bisire fonde. oros ergi de karun nonggime. geli elcin be labdukan i unggihe sembi. meni juwe niyalma duleke aniya jun gar i cooha. kalkai bade gidabuha seme alahade, ememungge adali oho seme gisurembi, ememu ursei gisurerengge. tshewang rabtan akū oho ci. geren ujan i urse gemu dain oho be dahame. adarambe ojoro be boljoci ojarahū seme ambula gelembe sembi. geli emu inenggi de surtsa be acafi alarangge. dorgi cooha hanci jihebi. ereci geli hanci jici. (364 – a) jun gar nukte de toktorakū ombi. ere aniya jakū n biyade juwan jugū n i coohalaha sembi. geli jun gar i lama amala bai niyalma oho emu niyalmai alarangge. ere coohalaha juwe jugū n i cooha. muteci dorgi cooha be afambi. muterakū oci ulha be hūlhaki seme unggihe sembi. geli hasak de coohalahabi. etehe gidabuha be sarkū. yerkim i jergi geren urse. jun gar baru cihakū. amaga inenggi de amba ejen i cooha de. jun gar urunakū gidabumbi seme gisurendumbi sembi. ere juwe niyalma yerkim i hūdašara hawai beg sere niyalmai sasa uyun biyai manashūn de isinjime uthai ere mejige be bithe arafi alibuha sehebi. uttu ofi. ladak i dejung namjal. (364 – b) polonai de unggihe de tanggūt bithe be suwaliyame gingguleme narhūšame donjibume wesimbuhe. hūwaliyasun tob i juwan emuci aniya. omšon biyai tofohon. gūsa be kadalara amban. amban cingboo meiren i janggin amban mala. aliha hafan amban miyoosaao. tsung bing guwan. amban jeo ki fung.

[本文责任编辑(特约) 永红]

 [作者简介]孔令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暨历史学系双联项目博士候选人。